

撞上门的女人

THE WOMEN WHO WALKED INTO DOORS



「爱尔兰」罗迪·道伊尔 著
黄昱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撞上門的女人

THE WOMEN WHO WALKED INTO DOORS

〔爱尔兰〕罗迪·道伊尔 著
黄昱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撞上门的女人/(爱尔兰)道伊尔(Doyle,R.)著;黄
昱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12
书名原文: The Woman Who Walked into Doors
ISBN 7-5327-2456-5

I. 撞... II. ①道...②黄... III. 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4638 号

Roddy Doyle

THE WOMAN WHO WALKED INTO DOORS

Copyright © Roddy Doyle 1996

中文简体字版通过博达版权代理公司获得

图字: 09-1999-350 号

撞上门的女人

[爱尔兰]罗迪·道伊尔 著

黄昱宁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字数 183,000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7-5327-2456-5/I·1435

定价: 14.30 元

回味苦难,是为了忘却

(代序)

—

书名既有冲击力,也不乏神秘感:撞上门的女人——你很难拒绝藏在它背后的幽暗而深远的想象空间。一本好书,理应是一座斑斓的庭院,未必是豪宅,却是你进得门去、走一间便有一重景致入眼的。书名便是那一挂纱织的帘,庭院里的无限风光,只让你隐隐地窥见轮廓,一副欲拒还迎的样子。倏忽不觉间,你已挑帘而入,一路走一路寻思,若不会一会屋里的主人,如何放得下这颗心来?

初识《撞上门的女人》,我也是这样“破门而入”的读者。后来因为有幸揽到了译介这本书的差事,又浮光掠影式地造访过几次——就这样进进出出的,添了许多感慨,也愈发地惴惴不安起来:曾有英国书评人下过断语,翻译罗迪·道伊尔的作品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a daunting job),因为他的书充满了“滑稽可笑的俚语、口语、俗语乃至粗话,生气勃勃,像充足了电一样的饱满,简直宛若音乐……”很难想象,如此绕梁三日的音乐,要是因为我的悟性差、笔头

FK06/32

拙而错了节拍、乱了韵律，到了中国读者的耳朵里就成了噪音，岂不罪过？

于是逼着自己静下心来，屏息凝神，再挑起门帘探一回路。想让译笔说得过去，首先就得做个称职的读者——不是一般地读，须品出个中神髓才好。

个中神髓，又岂是一下子就能看得真切的？

二

还是得从破题开始。

在爱尔兰，“撞上门的女人”(the woman who walked into doors)是人们心照不宣的委婉语，“婚姻暴力”的代名词。小说里有一段女主人公屡遭丈夫毒打以后的独白，浸透了血泪、屈辱，以及令人颤栗的麻木：

“……问我吧问我吧问我吧。打断的鼻梁，松动的牙齿，敲断的肋骨。问我吧。

没有人看见我。我很好，我好极了。我从楼梯上摔下来，我撞上了一扇门……”

这个“撞上门的女人”名叫宝拉·斯宾瑟，年纪不过三十九岁，却像是走过了几辈子的沧桑。小说开场，警察跑来通知宝拉，她丈夫查洛因为上门抢劫杀人而被警方当场击毙。惊闻噩耗，宝拉却连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恍惚中，她开始断断续续地回忆曾经有过的悲欢离合。

宝拉从小生长在都柏林的贫民区里，日子过得很清苦，一

到冬天,那种刺骨的寒冷,是可以让小宝拉哭出声来的,然而,就像大多数穷孩子反而有更旺盛的生命力一样,只要有一点点阳光,宝拉就可以活得很灿烂。在她的记忆里,小床边的印花窗帘,偶尔才可以尝到的冰淇淋,童年里唯一的那次挤在出租房里的全家旅行,都是让她快乐的理由。

宝拉的小学生活过得还算愉快,中学却糟透了。她呆在最让人看不起的六班,老师粗暴而愚昧,一群正处在青春期的少年除了用粗野的方式反击别人的粗野,什么都没有学会。然而,这一切还是没能完全剥夺宝拉快乐的权利。因为妈妈说她“长相漂亮得可以当模特”,因为她会坐在卧室的窗台上唱好听的歌,因为她的整个人生才刚刚开始,因为她遇上了查洛·斯宾瑟。

在宝拉的眼睛里,查洛是一个多么帅多么好的恋人啊——尽管他那个穷得叮当响的家里,几乎人人(包括他自己)都有犯罪前科,可是对于情窦初开的宝拉来说,属于她的那方小小的天空,是查洛魁伟的身躯支撑起来的。只有和他在一起,宝拉才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是有尊严的。

然后是结婚,是天堂一样的蜜月,二十岁的宝拉就像一株沾满了露水的百合花一样忘情地盛开……以至于当查洛第一次殴打已经怀了孕的宝拉时,宝拉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个笑话:

“后来我们确实笑话过这件事。笑话过那个夜晚。还有以后的那一次。还有再以后的那一次……直到我再
也笑不出来……我张开嘴,什么也出不来。只有痛苦。”

这样的痛苦竟然绵延了整整十七年。宝拉记不清查洛究

竟打过她几次,打完以后又“后悔”过几次,保证过几次,“体贴地”陪着她上过几次医院,然后又多少次推翻自己的诺言。除了姐姐卡米尔,没有人能够——或者说愿意——看出宝拉在承受着非人的折磨。宝拉无法解释这一切,只能责怪自己,只能逆来顺受。在家里,在急诊室,伤痕累累的宝拉,惟有一次次地重复:“我很好,我没事,我只是撞上了门。”

直到那个星期四的早晨,宝拉发现兽性大发的查洛居然企图伤害自己的女儿时,才像突然从噩梦中惊醒过来一样,拼尽了全身力气,要把查洛赶出门去。大约是被宝拉的气势吓倒了,查洛真的走了,这一走,再也没有回头。一年以后,他死在了警察的枪下。

无论如何,宝拉毕竟走出了查洛的阴影。尽管她每天喝得醉醺醺,尽管回忆经常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不由分说地将她淹没,她到底还是挺过来了。有多少次,宝拉躺在地板上,希望就这样死去,然而她最终还是站起身来——她没有权利去死,她必须用自己的劳动养活一家五口人。她的心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清澈澄明,她对自己说:

“那种感觉真是棒极了。我到底做了一件好事。”

三

这是一个关于痛苦的故事。那种酸楚,像极了一把钝刀,噬咬着宝拉的青春,也消磨着读者的承受力——直面惨淡的人生,是需要勇气和悟性的。几乎从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起,我们就在不停地追问:为什么宝拉会有这样的童年?为什么

宝拉要挨打？为什么宝拉不离开他？为什么一个美丽的女人的最美好的时光，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度过？

因为宝拉穷，因为宝拉周围的人和她一样穷。贫穷衍生无知，贫穷催化暴力，在贫穷面前，“生而平等”只是一句苍白的谎言。在医院里，宝拉发现，“那里总有别的女人，就像我一样在排队，都受了伤，都撞上了门。我从来没有想到，被丈夫送到这儿来的并非只有我一个……”环境产生的压力所施与人的扭曲作用往往超乎想象。在那样的环境里，愚昧是无所不在的，男权是天经地义的，忍受是理所当然的。除此之外，宝拉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别的活法。

这也是一个关于快乐的故事。宝拉是这样一种女人：纵然生活在荒漠中，心里总还寻得到一方绿洲；苦难如沙石般没过头顶，她还是要伸出脖子来喘一口气，没准还能发现阳光映照在砂砾上折射出很浓很艳很透明的光泽。回首往事，宝拉痛切地感受着自己的苦难，却从来没有一点自怨自艾的意思。虽然“本该有牙齿的地方只剩下豁口，本该让心脏呆的地方只留下一个空洞”，宝拉还是没有失去爱的能力：她爱音乐，爱孩子，甚至，一如既往地爱她那个不成器的丈夫。她甚至不再拒绝回忆，因为她知道，只有把那些阴湿的、辛酸的往事一件件细细点清，再放到太阳底下烘一烘，晒一晒，才能把它们永远地、彻底地隔绝在现实之外。回味苦难，正是为了更好地忘却它。

或者，这就是所谓“生命的张力”？

四

现在，是到了该认识一下作者的时候了。

罗迪·道伊尔,1958年生于都柏林,当过十四年的英语及地理教师,据说很称职。当然,他最成功的角色是作家,既写小说,也编剧本。主要作品有《巴里镇三部曲》(即1987年的《承诺》、1990年的《那个喋喋不休的家伙》和1991年的《货车》),《帕迪·克拉克,哈哈》(有人根据书的内容译作《童年往事》)和剧本《战争》(1989年)、《黑面包》(1993年)等。笔耕之初,道伊尔就凭《货车》一书得到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的提名,两年后又以《帕迪·克拉克,哈哈》正式获奖,而且创下了有史以来“布克奖”获奖作品的最佳销售记录,算是开了“曲高而和众”的先例。

据说道伊尔是个不太喜欢张扬的作家,诸如性情、喜好、家事长短之类的花絮很少见诸报端。略有几个熟悉的人形容其“谦逊、不造作,乐意栽培年轻作家”,道伊尔对此倒不以为然,“我可不是什么‘导师’,我想,如果我对他们指手划脚,说‘来吧,让我们这样干’,是不会有什麼作用的——‘克隆’的差事,还是留给羊吧。”

无论道伊尔的这种神秘感,是刻意为之,还是天性使然,对于有兴趣了解他的读者来说,最有效的途径还是去阅读他的作品。道伊尔只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从他的文字里,你可以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他的生活:

都柏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种生活,必是道伊尔耳濡目染、烂熟于心的。所以,在他的小说里,都柏林几乎成了承载起所有人物的悲欢的舞台。有人把道伊尔誉为“继乔伊斯之后又一位以书写都柏林为己任的文坛泰斗”,虽然有点夸张,却是言有实据,非空穴来风的。话说回来,虽然作家描述的对象局囿在都柏林(而且主要是下层社会),写作的指向却宽泛

得多。那样真切、坦白的感受,本来就是人类共有的——你完全可以把他笔下的爱尔兰小镇风貌当作上海棚户区的故事来读,想起并不遥远的从前,曾有过一部轰动一时的电视剧《穷街》。道伊尔的作品,虽然选的都是小视角,却往往充盈着大关怀。

市井小人物的每一种表情,每一点辛酸和快乐,必是道伊尔目光凝聚的焦点。他的早期作品较多地依赖于“纯粹的场景和大量的对白”,这一方面缘于作家擅写剧本、经常在创作小说之余为影视剧割刀助阵,另一方面也因为小人物的喜笑怒骂往往是最鲜活最精彩的亮点。及至《帕迪·克拉克,哈哈》,道伊尔才把笔触更多地伸向人物的内心世界,以至于面对这本书,读者的情绪久久交织在惊喜与疑惑中,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所谓“泼辣、幽默、粗线条”的道伊尔其实更像是一台高灵敏度的仪器,能精确地体察和记录人性深处隐秘而微妙的图像,波峰、波谷,以及中间的那些杂乱无序的线条,全都清晰到了慑人魂魄的地步。

贫穷,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表层的还是内核的,个人的还是民族的,过往的还是现实的,必是牵绊着道伊尔的梦魇。虽然没有找到可以佐证作家本人幼时家境的材料,我们还是可以断定,道伊尔对于“贫穷”的观察与理解,决非朝夕之功——没有现实生活中的经历,很难有这样深沉的切肤之痛。道伊尔一向崇拜狄更斯,希望能在自己的笔下再现狄更斯勾勒下层社会的非凡功力和人道情怀。在爱尔兰,经常会有人指责道伊尔对于穷困的生活描写过于逼真,“有损于民族形象”。对此,作家本人的解释不疾不徐,平静如水:“生活本来就是如此,我没有作丝毫篡改。”

五

《撞上门的女人》写于1996年。据作者本人所言,创作的灵感源于他自己担任编剧的一部名叫《家庭》的电视连续剧。剧中的妻子有着与宝拉相仿的经历,完稿之后,道伊尔意犹未尽,总觉得还有话没讲完。“这个女人的故事将会衍生出一本书来。”道伊尔兴致勃勃地想象着她把丈夫赶出门去以后渐渐回到正常生活中,“然后,在某个晚上,坐在厨房里的一张桌子上,开始写——写她自己的痛苦和梦想……”

就这样,道伊尔沉入了宝拉·斯宾瑟的世界。在小说中,作者自始至终用第一人称,对于女人心态的把握纤毫入微,几乎已经到了忘我的境界。至少,作为一个女人,我在阅读、翻译的过程中,经常会被一种矛盾、突兀的情绪所左右:合上书本,我知道写书的是罗迪·道伊尔,一位功成名就的爱尔兰男作家;一旦翻开书页,那些灼热的、细腻的文字映入眼帘,于是我相信,说话的是宝拉·斯宾瑟,一个才绽放便枯萎却始终不肯凋零的女人。

宝拉是一个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女人,不会用复杂的句子,也说不出大字眼,所以整部小说几乎全是由絮絮叨叨、直来直去、且节奏感十足的简单句组接起来的。她的思绪不时地在现实与往事之间跳跃,因此在某些段落,行文刻意地回旋反复,而每次反复又略有修正、扩充。加之虚拟与现实互为参差、不着痕迹地连缀在一起,其情其状,犹如乍闻痴人说梦,又像聆听巴赫的平均律练习曲那样享受“可疑的快感”——乐在其中,却不知妙处在哪里。

作品因此而变得精致起来。是那种别有一格的精致。尽管罗迪·道伊尔用来构建作品的材料取自喧嚣、琐屑、穷困甚至粗俗的下层社会,可他的设计方案、他用来堆砌的黏合剂却是费了好一番心思的。当“诗化”已经成了“不知所云、大而无当”的代名词时,道伊尔的精工巧作却让《撞上门的女人》成了一首真正的抒情诗。诗中的华彩,或许是宝拉最爱听的那首歌,里面饱含着她从来不肯泯灭的梦想,那是她,也是支撑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活下去的力量的源泉:

“——当你对着一颗星星许愿——
不管你是谁,都没有差别——
无论你心里有怎样的渴望——
它们都会实现——”

译者
2000年6月

1

上门来告诉我的的是一个警察。我以前没见过他，他并不是经常上门的那几位。他只是个毛头小伙子，皮包骨头，脖子上长满了粉刺。

——是斯宾瑟太太吗？

他最多不超过二十岁。看上去惨兮兮的。

——是斯宾瑟太太吗？

他还没开口，我已经明白了。我一开门，心里就“咯噔”了一下。（有好几年光景，一打开那扇门，我就灵魂出窍。我讨厌开门；这让我害怕。我们有个刺耳的门铃，只要有人按它，就会像拉警报一样震得墙壁摇摇晃晃。这声音总是把我吓得从地板上一跃而起，孩子们便开始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真他妈的恐怖。你一下子就掉进了陷阱，给人当场抓个正着。你四下里打量，想把身边所有可以作为罪证的东西藏起来，那都是查洛留在客厅里的东西，是他抢来以后留在客厅里的。我老在他耳边唠叨，而且一天差不多有五六次吓得屁滚尿流，他这才把门铃换掉。我的大女儿妮科拉不愿意绕到后门再进屋。她想从大门进来；这样做显得更成熟。她一分钟要按十次门铃。

——忘了我的茄克衫。

——忘了我的钱。

——不喜欢我身上穿的这条牛仔裤。

我打了她——她已经有十二三岁了，早过了该挨揍的年纪——当她在某个星期六的早上第一百次按响门铃的时候。我是用一个女人打另一个女人的那种作派揍她的，扇她的耳光。当时我有一点喝醉了，这一点我必须承认。我挺后悔的，打过她的脸之后，我想办法停住了手，收回来。她举起手捧住脸颊。我打过的地方红通通的。她目瞪口呆；她没有注意到，我此时越发恼火了。在她这种年纪——不管是什么年纪，别人是不会这么干的。我替她难过，可她真是活该。因为自己喝醉了酒，我感到既难过，又羞愧，还很生气；通常，我能保证不让别人看出我的火气来。我应付不了，虽然那只是个笨头笨脑的门铃。她说她恨我，猛地一摔门，跑了出去。我随她去。新门铃挺不错，一按“叮当”响，可是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善。无论何时，只要有人按门铃，我照样会觉得自己又死过去了几分。那些来寻查洛的警察，来找约翰·保罗的老师，还有来搜罗钞票的人。在一所到处是小孩的屋子里，是很难躲起来的，很难装出一副“家里没人”的样子。叮一当。从门外进来的只有坏消息；我姐姐，我爸爸，约翰·保罗，查洛。叮一当。）我一打开门，看见那个警察，心里就“咯噔”一下全明白了。还没等我作好弄明白这件事的思想准备，他的脸就已经告诉我了。他不是来找查洛；这可不寻常。他吓坏了，有什么话他不得不告诉我。我替这个可怜的小伙子难过，他受人派遣，只好干这种让人憎恶的差事。其他那些饭桶，躲在外面，坐在车里，懒惰而乖巧，不愿意进来亲口告诉我。我请他进屋喝一杯茶。他坐在厨房里，连头上的帽子都没有摘下来。他把家里的一切都告诉了我。

2

初见查洛,我就神魂颠倒。确实如此。我没有昏过去,也没有跌倒在地板上,但两条腿直发软,还咯咯地傻笑。我突然意识到了肺的存在,因为此刻肺全给掏空了,而且正在萎缩。

查洛·斯宾瑟。

他就在那边,在那边,斜靠着墙。

菲奥娜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

——他在那边。

我看见了他,我也知道她指的是谁。毕竟我听说过他的事情,毕竟我对他有所期待,所以我知道那不可能是别人。他和一伙人呆在一起,却又显得特立独行。他的手插在口袋里,大拇指勾在工装裤上,嘴上叼着一支香烟。当时这一幕把我给吸引住了,至今想来依然入迷:香烟是性感的——哪怕有气味、能致癌,也是值得的。黑色短茄克,条纹长裤、懒汉鞋——他穿的跟那个年头所有人都一样,可是那身工作服就像是为他量身定做似的。其他男孩在他身边显得粗粗笨笨,丑陋不堪。他身材修长,模样强悍而不失光洁。他完全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但他知道我们在注视着他。

我们正在围成一圈跳舞,我们的茄克衫、套衫和包包袋袋

统统堆在我们面前的地板上,我还出了点汗。我是在看见查洛的时候感觉到自己出汗的。这不是一种迷恋——站在那里的并不是大卫·卡西迪或者大卫·艾塞克斯^①——那是性。我真想过去咬他一口。

他把烟从嘴里抽出来——我能感觉到他的嘴唇先是略略动了动,接着再松开——然后吐出一团妙不可言的烟雾,吹到灯光下。它驱散了原先的烟雾,直冲上天花板。接着,他重又把烟夹到唇间,手放回口袋里。他温文尔雅;这个词用在当时不见得合适,可他确实如此。

那音乐。我记得。女人总是能记住音乐。是《甜蜜宝贝爱人》。“鲁贝蒂斯”演唱组^②的。那是一首十全十美的歌,甜蜜而轻快,伤感但不过火,调门很高,却有十足的阳刚气。仿佛是专为查洛演唱的主题歌,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他与此无关;歌是DJ挑的,恰恰选在此时此地。选得正合适;天衣无缝。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这么回事。可我没料到他会看我。我没料到他会从墙那儿走过来。我没料到他会站在我面前。我甚至还来不及做这样的梦。

他过来了。烟掉到地板上;他把烟弹开,也不看它会飞到哪里去。他径直向我走来,却不瞧我一眼。我吓傻了;他要从我身边走过去了。

——你想跳舞吗?

我让他稍稍慌了一下神。

——好。

① 大卫·卡西迪,大卫·艾塞克斯,均为好莱坞男影星。

② 英国著名演唱组。

他把时机掌握得很好。“鲁贝蒂斯”刚巧唱完,弗兰奇·瓦利^①正开始唱《我的双眸对你情有独钟》。他肯定是故意安排好的。弗兰奇唱“我的”时,他的胳膊正好挽住我的胳膊;弗兰奇唱到“双眸”时,他的十指正好交叉起来,搁在我背上。他喝过酒。我闻得出来,但这没有什么要紧。他没有喝醉。他的胳膊搭在我的臀部上,带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

——可我从未用手把你触碰

我的双眸对你情有独钟——

我把头靠在他肩上。他拥有了我。

① 弗兰奇·瓦利,美国歌星,既作为“四季演唱组”的主唱,同时也录制独唱专辑,主要活跃于六七十年代。